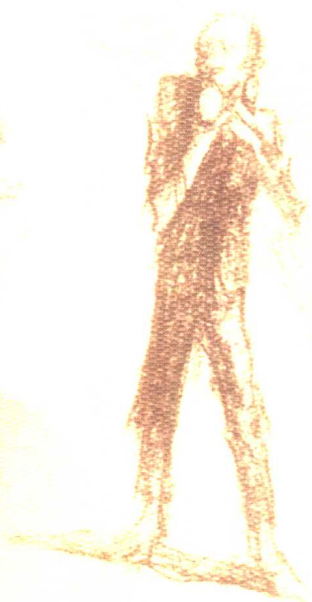


鲁迅与日本人

——亚洲的近代与“个”的思想

伊藤虎丸 著 李冬木 译

迅



回望鲁迅

孙郁 黄乔生 主编

回望鲁迅

鲁迅与日本人

——亚洲的近代与“个”的思想

伊藤虎丸 著 李冬木 译

河北教育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鲁迅与日本人：亚洲的近代与“个”的思想/（日）
伊藤虎丸著；李冬木译．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
2000.7

（回望鲁迅丛书/孙郁，黄乔生主编）

ISBN 7-5434-4014-8

I. 鲁… II. ①伊…②李… III. 鲁迅 (1881~19
36)-思想评论 IV. I210.97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0) 第 45509 号

回望鲁迅
鲁迅与日本人
——亚洲的近代与“个”的思想

伊藤虎丸 著 李冬木 译

河北教育出版社出版发行（石家庄市友谊北大街 330 号）

河北新华印刷一厂印刷

850×1168 毫米 1/32 13 印张 192 千字 2000 年 12 月第 1 版

2001 年 5 月第 2 次印刷 印数：1001—2000 定价：16.90 元

ISBN 7-5434-4014-8/K · 140

序 言

中国近代文学为什么受冷落

调查和探讨一个作家及其作品，就是要向他和他的作品探寻些什么。所谓出色的学术业绩，最重要的首先是要把其中的问题构架好。正像今天的日本或世界，正处在巨大的思想转折点上，正在重构过去的思考框架（例如资本主义、社会主义等等）本身一样，在这个意义上，也就要求提出根本性的问题。但是，很遗憾，对于同是东方人的文学家鲁迅的探寻，我却只能从作为学校教师的极其狭窄的日常性生活视野出发。我一直在思考着青年时代迎来的战后民主主义和作为教师所经历的“大学纷争”^①这两种经历的意义。提出的问题没能越出过去的思考框架一步，虽自认没出息，但也只能执拗地恪守自己的经验。

我们日本人，一般来说，都很爱读西方近代小说。书店里也因此而过多地陈放着翻译和介绍西方文学的书籍。与此相比，和亚洲各国的近

① 指 60 年代后期日本发生的大学学生运动。日本战后，特别是 50 年代，学生运动始终没有间断过，但在 1968 年前后爆发的大学学生运动，不论在规模和数量上都是前所未有的，据说曾波及了 116 所大学之多。导致这场运动的原因有很多，但主要集中在教育的大规模生产化、大学的非民主性管理和运营体制的弊端等几个方面，学生的基本要求也就相应地表现为要求改善大学教育、否定产业协同体制和由学生来参与的大学管理等几个方面。这场运动有着当时世界规模的学生运动背景，并在后来发展为具有反体制倾向的政治运动。1969 年 8 月自民党强行通过了《关于大学运营的临时措施法》之后，这场运动在并未解决导致上述冲突的状况下平息了下来。本书作者在后面有对学生运动的精神方面进行反省的话。——译者注

1967

代小说有关的书却少得可怜。中国的还算有一些，朝鲜、越南、印度等国的作品在普通书店里的书架上是很难找到的。

看看我的周围，以汉语为第一、第二外国语的大学虽然多了起来，但学生人数同学英语、德语和法语的学生相比却微乎其微。至于朝语和越语，则几乎没有哪所大学在讲授，而能称得上朝鲜文学专家和越南文学专家的，在日本也只能找到屈指可数的几个。

我们平常视这种状况为理所当然，并未重新思考过这是为什么。就如同容易想像到在法属殖民地国家的知识分子中，学法语的人会是很多的一样，一个国家的知识分子大多选择哪种外语，便可以显示出这个国家的文化是以哪个方向为目标的。明治以来的近代日本，虽然表面上没有成为殖民地，但却仍然是以西方为范本的。西方文学的翻译介绍甚多，而亚洲文学的翻译介绍却甚少，便是其表现之一。然而，由于没成为特定国的殖民地，所以其学习范本也就按照不同来源而分化为各种领域。战前，医生和自然科学工作者多修德语是定了的，同样，海军学英语，陆军学德语，而即使在陆军当中，炮兵则以法语为主，据说，这是为了学拥有拿破仑以来炮术传统的法国的缘故。

但是，我以为，文学艺术是和所谓“精神文明”相关的领域，情况和学习医学等“物质文明”多少有些不同。我们为学习西方的“物质文明”，而去不近情理地学英文、德文，在文学即“精神文明”方面，却对邻近的亚洲各国文学并不抱有真正的（作为实感的）亲近感。说白了，中国近代文学的译书甚少，是由于卖不动，而卖不动的原因，又是日本读者觉得中国近代文学不如西方近代文学那么有意思的缘故。这不能简单地归结为由于日本人在观念和思想上崇拜西方，蔑视亚洲。即使在那些十分珍惜同亚洲各国人民的友好和交往的人们（他们对中国革命怀有深切的同情）当中，也的确有很多人在实感上觉得亚洲文学缺乏可读性。

就是说，问题在于，在评价日本人对亚洲文学不感兴趣这种情况是好是坏之前，应首先弄清我们为什么会觉得亚洲文学没意思。明治以来，日本以西方为范本开始近代化已经有了近一百二十年的岁月。现在，或许值得我们重新思考一次过去的一向认为理所当然的我们的思考方式。说“实感就是实感”还不算完事，倘若深入地开掘到为什么会产

生这种“实感”，去想一下将会怎么样呢？如果是这样，不是就不存在理所当然之事了吗？而且这里不是就隐藏一个对于日本将来文化模式的大疑问吗？鲁迅被称为“中国近代文学之父”，我在本书中所要探讨的他是怎样接受西方近代的，在这当中他和在很大程度上可被认为充当其媒介的日本文学的关系是怎样的问题，也与上述疑问密切相关。

对于明治以前的日本人来说，中国语——汉文是惟一的外国语，中国文化，就如同明治以后的西方文化一样，在很长时间里是日本的知识分子憧憬的目标和范本所在。值得我们骄傲的那些日本文化遗产，诸如奈良的法隆寺^①和白凤、飞鸟时代^②的佛像等，到底有多少是日本人的独创呢？正像人们所熟知的那样，它们是中国艺术的巧妙的日本化；即使在《万叶集》^③和《源氏物语》^④那样的最日本式的古典作品中，其实

-
- ① 法隆寺，位于奈良县生驹郡斑鸠町圣德宗总寺院，又称法隆学问寺。据说由推古天皇和圣德太子承用明天皇之遗命，完成于公元7世纪初。——译者注
- ② 在日本文化史上，一般把以推古王朝（592～628）为中心的文化称为“飞鸟文化”，把以天武王朝（673～686）和持统王朝（687～696）为中心的文化称为“白凤文化”。在飞鸟文化时期，文化的主要特征是，经过朝鲜半岛，大规模地引进佛教文化，在以寺庙为中心的建筑工艺技术、雕刻、美术等方面，深受中国六朝文化的影响；儒学和汉字也在这一时期传入日本，日本人已经开始用汉字作为表记符号。一般认为，飞鸟文化对未来日本文化的发展产生了重大影响。白凤文化出现于大化改新（645）之后，和飞鸟文化相比，受隋、唐（初唐）文化影响很深，但开始摆脱上一个时期对外来文化消化不良的朴拙，而转向富有创造性的清新活泼，除了汉文、汉诗是贵族的必修教养外，更富于日本特色的“和歌”，也在这一时期出现了许多优秀作品。——译者注
- ③ 《万叶集》，日本最早的和歌集。现存20卷，共收集上至天皇、下到平民百姓的长、短和歌约4500首。文字均用汉字注音，号称“万叶假名”。关于这些和歌的创作年限，至今仍有争议。据《万叶集》记载，最早的和歌，为公元4世纪的仁德皇后磐媛所作，但似不可信，通常认为，收集的是从舒明天皇时代（629～641）到公元759年约130年间的作品。《万叶集》经多次编辑而成，据说编辑者是大伴家持（717～785）。《万叶集》不仅是日本口头歌谣进入文字记载的重要标志，也是研究日本古代史的重要资料。——译者注
- ④ 《源氏物语》，日本最早的长篇小说，创作于公元11世纪初，为平安时代（公元9～12世纪）女作家紫式部所作。主要描写了平安时代前期和中期的宫廷贵族生活，共由54帖构成，前44帖写皇子光源氏和周围许多才女的爱情纠葛，后十帖称《宇治十帖》，写光源氏之子薰周围的各种复杂的人际关系。《源氏物语》以卓越的创作成就被称为日本文学史上的奇迹，并且成为后来物语文学的典范，同时，在世界文学当中也获得很高的评价，我国已有中文版出版。——译者注

也包含着大量的可说是中国诗文巧妙翻版的内容。正像今天的西方文学一样,中国文学的大部分主要作品,老早就传入日本或在日本被翻印,其中有不少就像明代小说作品那样,早已不见于本国而却独在我国流传。截止到明治初年,清朝诗文(当时的中国现代文学)也一直很快就被传到日本,并且作为“同时代文学”影响着日本的文学倾向。

对于明治以前的日本人来说,中国文学在所谓同时代的意义上是深切关注的对象。例如,如果读一下江户时代的文学家对中国诗文的批评之类,就会惊讶地看到日本的知识分子怎样深广地涉猎中国文学,怎样和中国人一样,有时竟在中国人之上地去细腻品味中国文学的。这个事实表明,对于他们来说,中国文学充满了无上的乐趣。本居宣长等人兴起的“国学”^①,至少是以反驳当时知识分子的上述普遍倾向为一个契机的。

中国文学在我们日本人眼里变得索然无味,是进入近代以后的事。当然,提到夏目漱石^②和芥川龙之介^③,会举出著名的《草枕》^④开头和漱石留下的许多杰出的汉诗的例子来,中国文学对他们来说还是有意思

① 又称“倭学”、“古学”等,“国学”是明治时代以后所统一使用的名称,指江户时代(公元17世纪初~1867年)兴起的以文献学方法研究日本固有文化特别是神道思想的学问。主要代表人物有荷田春满(1669~1736)、贺茂真渊(1697~1769)、本居宣长(1730~1801)、平田笃胤(1776~1843),号称国学四大家。“国学”是相对儒学和佛学而言的,针对“汉心”、“佛心”来强调“大和心”,特别是本居宣长对当时的学问即“汉学”(儒学)表示不满,提倡尊皇观念和神国思想,因此具有强烈的排斥儒学和佛学的倾向。——译者注

② 夏目漱石(1867~1916),日本近代小说家。原名金之助,别号漱石,生于武士家庭。曾留学英国,回国后任大学教授。1907年任《朝日新闻》特约记者。代表作有《我是猫》、《哥儿》、《门》、《心》等。——译者注

③ 芥川龙之介(1892~1927),日本近代小说家。别号柳川龙之介、澄江堂主人等。入东京帝国大学(现东京大学)的第二年即开始发表作品,因得到夏目漱石的赏识而登上文坛。代表作有《河童》、《鼻子》、《地狱变》、《罗生门》等。——译者注

④ 夏目漱石发表于1906年的中篇小说。写一个画家力图逃避尘世的烦恼,刻意去追求“非人情”美的生活和感受。作者自称这篇小说“是以美为生命的俳句式的小小说”,体现了漱石早期追求趣味和唯美的所谓“低徊趣味”的文学观。作品开头引用了陶渊明的“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和王维的“独坐幽篁里,弹琴复长啸。深林人不知,明月来相照”的诗句,并有关于他们的“哪怕是在很短的一段时间里,也想逍遥于非人情之天地”的议论。——译者注

的。但这却只限于中国的古典文学。他们对中国同时代文学，即中国近代文学的兴趣，恐怕也已经完全丧失了吧。虽然汉文曾是他们文化素养中的一大支柱，但“支那语”^①却没能成为关心的对象。而且，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汉文也从我们的修养中消失了。

日本——学习西方近代文化的“优等生”

那么，中国近代文学为什么远没有成为我们的兴趣对象呢？这是一个大问题，我准备从两个方面给予探讨。

第一是自不待言的事，觉得新输入的西方近代文学更有意思，并不单纯是日本知识分子的喜新厌旧、见异思迁使然。指出日本人移植西方文化时态度浅薄的议论有很多，然而，我们的先人之所以不仅在科学技术（物质文明）而且也在文学（精神文明）方面深深地热衷于西方近代，不正是因为他们西方近代市民社会里发现了新的真理，在西方找到了不论是在物质文明方面还是在精神文明方面都优越于亚洲的价值吗？所以，他们坦率地对西方文化感兴趣，被西方文化所吸引，并且要学习西方文化。

这种态度是无可指责的，但问题在于，正如人们一向所认为的自明治以来日本人在承认他人的优越即自己的败北方面的不彻底性，就像把1945年的“败战”置换为“终战”的态度一样。例如，战前我们一般接受的教育可划分为两种：一种是人文方面的汉文和修身教育，一种是为推行文明化、近代化而实施的科学、技术及外语教育。经常会听到东方或日本的精神文明、西方的物质文明这样的提法。科学技术并未作为人的灵魂问题、伦理问题，也就是作为西方的精神文明来传授，而日本或东方的精神近代化也并未成为问题。因此，中国文学只是作为汉文典籍被关注，近代化了的中国文学没能成为感兴趣的对象也就是情理之中

① “支那”作为中国的别称，其词源并不明确，据说是古代西方对秦始皇统一中国之后“秦”的称呼，或称 China，或称 Thin，或称 Sinae 等，“支那”这两个字译自佛经。近代日本也称中国为支那，但由于有侵略亚洲的背景，也就因此使这个词具有了蔑视的意味，战后已不再使用。所谓“支那语”，指近代中国的语言和文字。——译者注

的事了。

不论怎样高唱日本或东方的精神文明，既然在事实上承认接受了西方的科学技术，已经是极大的妥协了。这里存在的矛盾一直不被多数人注意，而且同样，我们也把科学（或制度）和文学分割对立起来，毫不怀疑地认为，前者是客观的，是理性的；后者是主观的，是感性的，而没能意识到近代科学、近代文学以及近代各种制度都是近代精神（文明）的产物。这种情况，在那些和我们一样 19 世纪才同西方近代相遇的亚洲其他国家中也同样存在吗？至少在鲁迅那里是怎样的呢？

第二，对我们来说，中国近代文学没意思，不是正因为我们由衷地憧憬西方，并将西方作为惟一应该学习的权威，甚至在某种情况下或某些领域内恨不得变成西方人，因此也就感受不到了“落后”的其他亚洲国家文学的兴味了吗？换句话说，我们不再对本国文学所具有的个性拥有自信心和自豪感，不也是这种表现之一吗？

我们的骄傲在于，在亚洲国家中，日本在对西方近代的接近度上，是最先进的国家，是优等生；不，甚至在某些领域内已经超过了正統的西方。正是因为是最优秀的学生，也就当然没必要去注意其他亚洲后进国家的文学，而只要选择那些最先进最优秀的国家的文学去学习就可以了。这样，几乎没有人去学弱小国家或民族的文学，也就并非不可思议了。

如果换一种说法的话，那就是在日本也有一些人认为，不仅要学习西方的物质文明，而且也要学习西方的精神文明。基督教徒、马克思主义者以及其他所谓的西欧主义、近代主义的传道者，在日本近代史上并不少见，甚至成为主流。但是在很多情况下，不是可以说这些人也并不是希望日本的精神文明本身发生改变，而是希望它更接近西方的精神文

明，以至与西方文明相同吗？竹内好^①曾区分了这两种精神状态，把前者称做“转化型”^②，把后者称做“转向型”。他认为，虽然“转化”和“转向”在“变化”这一点上是相同的，但“转化是以抵抗为媒介的，转向则没有媒介”（《现代中国论》）。竹内好说的“抵抗”，就是“坚守自己”（即把自己坚持下去的意志），也可以称做自立或独立的精神。从表面上看，“抵抗型”是保守的，而“转向型”是进步的。

竹内好还把日本近代文化的整体叫做“转向文化”和“优生文化”，更具体地指出，承担日本近代文化主流的是近代主义者。一般说来，“近代主义者”是日本的马克思主义者针对存在主义者和民主主义者提出的，后者往往既不反动，也不革命，持中间立场。但竹内好提出的“近代主义”，是他独创的概念，主要指“在残存着等级制意识的前近代社会里，将欧洲近代思想作为权威从外部拿来时产生的意识形态”（出处同上。在他看来，日本的马克思主义者是代表这种近代主义的）。也就是说，基督教（新教主义）也好，马克思主义也好，存在主义也好，被拿来的确实都是欧洲近代思想，但是，接受这些思想的主体方面的意识，仍残存着前近代的等级制意识，即尊卑观念、权威主义，欧洲近代思想是被作为权威接受下来的。因此，日本是用前近代的封建意识

① 竹内好（1910~1977），鲁迅研究专家，评论家。长野县臼田町人。1934年毕业于东京帝国大学（现东京大学）文学部支那文学科。毕业之前，和冈崎俊夫、武田泰淳等人组织的中国文学研究会，为日本以后的中国现代文学研究奠定了基础。1944年出版的《鲁迅》一书，被称为第二次世界大战当中日本的名著之一，是日本第一本真正研究鲁迅的专著，其鲁迅观对战后日本的鲁迅研究产生了重大而深远的影响，以致有“竹内鲁迅”之称。1954年任东京都立大学教授，1960年因反对国会强行通过日美安全保障条约辞职。在以《现代中国论》（1951）为代表的许多著作和文章中，竹内以中国为日本相反的参照，对日本近代文化当中的近代主义性格和社会所进行的批判以及对国民文学的提倡，均产生了重大影响。1977年因患癌症去世。有个人翻译的6卷本《鲁迅文集》（1976~1978）和17卷本《竹内好全集》（1980~1982）。正如本书作者在行文中所阐述的那样，本书也正是从“竹内鲁迅”出发去重新探讨鲁迅的。关于本书与竹内好的关系，除以下行文中随处提到的而外，《后记》里作为参考书提到的竹内好的著作也可作为参考。——译者注

② 原文为“回心型”。日语当中“回心”这个词，来自英语的 Conversion，除了原词所具有的转变、转化、改变等意思之外，一般特指基督教中忏悔过去的罪恶意识和生活，重新把心灵朝向对主的正确信仰。竹内和本书作者使用这个词，包含有自觉或觉醒的意思。——译者注

来学西方近代思想，并将后者作为权威或教条来接受。

这种态度，同丸山真男^①指出的那种“把欧洲近代‘思想’从造就它们的精神当中剥离出来，作为可能交换的‘零件’来输入”（《日本的思想》）的态度是一致的。就是说，前面提到的在接受西方近代时，将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分离的不彻底性，同这里所说的把西方近代权威化的态度，看似矛盾，实则相同，不是正反映出我们身上根深蒂固地残存着封建意识和奴隶根性吗？

我们对中国（或亚洲）近代文学感到没意思的理由，此外还有很多吧。关于这些问题，我准备在后面考察鲁迅小说的过程中具体涉及到一部分，但原因所在是不是已经在上面说清了呢。

其证据是，近年来的比较文学研究方兴未艾，把日本近代文学同正统的西方文学进行比较，或慨叹其后进性，或反过来骄傲其独特性的讨论似乎很有进展；然而，把日本近代文学放在同样是以和欧洲近代文学相遇为产生契机的亚洲其他国家的文学当中，来相对考察比较它们各自的固有价值的工作，却几乎尚未进行。而没有这项工作的深入进展，我们也就很难自觉获得日本近代文化的自立性。为此，就应该首先克服那种一元化的思考方式，不能按照所谓“先进国——后进国”的图式，即像大学入学考试时以分数的多少来纵列考生的名次（人们相信人是可以这样排列的）那样，以是否接近作为模范或权威的西方近代（某些既成的制度、思想、生产力等等）的程度，来当做衡量亚洲各国的尺度。否则，我们对中国和亚洲其他国家便会永远只采取一种态度：要么把这个国家崇拜为权威，要么侮蔑这个国家的落后，而无法彼此保持相互间的独立关系。鲁迅说过，“奴隶和奴隶主是相同的”。在这个意义上，崇拜

① 丸山真男（1914～1996），日本现代思想家、政治历史学者。1937年毕业于东京帝国大学（现东京大学）法学部，1940年任该学部副教授，1950年起任教授，直至1971年辞职。在东京大学法学部任职期间，不仅在东方政治思想史方面开拓了许多新的教学和研究领域，而且也以对影响世界的各种政治思想、政治体制的评论和批判，在战后日本思想界发挥了先导作用。主要著作有《日本政治思想史研究》（1953）、《日本的思想》（1961）、《现代政治的思想与行动》（第一版1956～1957，增补版1964）、《在战中与战后期间》（1976）、《从后卫的位置出发》（1982）、《读〈文明论之概略〉》（1986）等。作者在本书中对丸山真男也有相当多的引用。——译者注

与侮蔑也是相同的，都体现着独立的欠缺。

向鲁迅探寻的五个问题

上述思考方式，自明治以来，特别是日俄战争以后，一直贯穿在日本人推行近代化的努力当中。竹内好称之为“近代主义”的，也正是这种思考方式。这种精神的最后归结点，就是1945年的战败，而战后日本人的反省和出发点又正是从这个历史结果开始的。为了在那场悲惨的战争中死去的人们不至于白白死去，其道路只有一条，那就是对待亚洲各国不是采取或先进或落后、或崇拜或侮蔑的态度，而是建立起承认彼此是不同者的真正的对等关系，这就是战后中国研究的出发点。

战后日本的中国形象，就确立在如此反省的基础上，人们在中国近代当中找到了和日本不同的另一种近代，一种“真正的近代”。——这是今天所难以想像的。不久，伴随着这种看法的迅速衰退，又在现代中国当中发现了“反近代”或“超现代”，也有些人把“社会主义”中国作为思想先进国来加以礼赞。这似乎打破了“优等生”意识，实际上只是用另一种尺度（如马克思主义理论）来衡量“先进”和“后进”，并没超出竹内好指出的那种“近代主义”式的思考框架。打倒“四人帮”后，“思想先进国”的中国形象，又简单地变成了“经济后进国”的中国形象，不就是最好的证据吗？

今天日本人的中国心象、中国观，有时会令人吃惊地感到，似乎又倒退回了战前。与其说是倒退，倒不如说是在前面提到的那种一元化的“先进——后进”的思考当中，日本人不论是现在还是战前都没有发生改变。我之所以重新强烈地感受到这个问题，是由于最近偶然读到了战后不久的1948年1月竹内好写下的以下文章的一段：

……就像日本的社会矛盾总是由对外扩张而得到模拟性解决一样，日本文学也总是通过对外寻求新花样来掩盖自己的贫乏。认为不碰壁是自己进步的缘故，而一旦看到对方碰壁，便把自己的后进性都转移过去，当做对方的后进性。只要奴隶想当奴隶主，就不会丧失希望，因为他可能不是奴隶，因此也就不会产生自己是奴隶的

自觉。……^①

这不就是原封不动的现代日本人的中国观么？这不也是被叫做“日本第一”（美国出版了一本介绍日本的书，题目叫做 *Japan as No. 1*）的高速增长国家的日本形象吗？明治以来，把西方的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剥离开来，从而实现了震惊世界的高速“近代化”，并且成为军事大国的日本，在应从对这种“近代化”进行根本反省出发的战后，实际上，又完全故技重演，只是以震惊世界的高速增长，转而成为经济大国而已。如果是这样的话，那么今天日本人的傲慢，可能会是日本人重蹈过去不幸覆辙的危险征兆。我们为什么会觉得中国近代文学没有意思的问题，对我来说，正是这样一个问题。

战后，竹内好曾经根据鲁迅，反省了日本的近代。我是从现在的时间和地点出发，再次执拗地向鲁迅探寻同样的问题。当然，我同竹内好所处的状况已经不同。战后有日本的战败和中国革命的成功这样的对置起来的构图，而今天在经济高速增长的成功和“文化大革命”的失败的构图上，日中恢复了邦交。正因为这看似相反的两种构图，才使我们应该回过头来执著于竹内对日本近代的批判，同时，在那以后的三十多年间里两国人民各自经受的种种挫折的经验的基础上，我对鲁迅的探寻也就当然不会是一样的。

第一，竹内好以鲁迅型的近代来代表中国的近代，并以此作为批判日本型近代的一面镜子。我不否认这一点，但是我想从鲁迅型的近代，即使在中国的近代当中也是孤立的、也是异端的这一侧面（这和鲁迅在现代中国，特别是“文革”时期的中国，被弄成他所最讨厌的偶像和权威完全是两回事）来探寻鲁迅提示的作为日本和中国双方共同课题的问题。

第二，与上述问题相关，竹内强调，鲁迅同日本文学毫无关系，没

^① 《鲁迅与日本文学》，收入《鲁迅杂记》。重点号是作者所加，以下文中的重点号，如不做特殊说明，均与此相同。——译者注

受到日本文学的任何影响，并把“森鸥外型”^①和“鲁迅型”对立起来；而我却要在鲁迅学习的明治时期的日本文学当中，试图搜寻至少可能存在的与“鲁迅型”共通的接受近代的模式。

第三，竹内探讨的问题是，“存在主义”式的“文学者鲁迅”，是如何衍生为不断战斗的“革命者鲁迅”的；而我则要探寻总是偏激且党派性很强的鲁迅，为什么又总能具有慈爱和宽容的一面（虽然日本的激进派总是威吓恫吓，断人以罪），他的偏激又是怎样保持在他一生当中这一秘密的。

第四，竹内把日本文学评论界存在的“文学与政治”的对立和分离作为问题，而我则把学生当中可以经常看到的“文学与科学”的对立和分离作为问题。与此相关，竹内评作为小说家的鲁迅时说，“鲁迅的小说很糟糕”，“他的小说是诗歌式的”，“他有直感而无构架”；与此相反，我认为，鲁迅的小说是极其出色地“构架”起来的，我想对他是如何以科学的方法（现实主义），“重构”现实社会的这一问题给予重视。

第五，包括竹内在内，人们历来多强调鲁迅小说对社会黑暗的暴露；我却想重视另一面所存在的他是怎样努力塑造出新的英雄人物和具有积极意义的人物的。具体地说，就是关注竹内好在《鲁迅论》中推定为“十有八九是多余”的《故事新编》中的作品。

包括以上几个方面在内，我现在要向鲁迅探寻的整体问题和竹内好一样，那就是亚洲近代文学中所存在的和日本近代文学不同的接受欧洲的方式。换句话说，现在我所看到的鲁迅形象，一言以蔽之，就是可称

① 森鸥外（1862~1922），日本明治时代的小说家、翻译家、评论家、军医，本名林太郎。1881年毕业于东京大学医学部，任陆军军医。1884年留学德国学医，1888年回国后，历任陆军军医学校教官、陆军省医务局局长、皇宫博物馆馆长等职，同时，开始翻译和创作活动。曾译歌德、莱辛、易卜生等人的作品。创作成就主要表现在早期的浪漫主义小说和后期的史传文学方面。前者的代表作有《舞姬》（1890）等，后者的代表作有《阿部一族》（1913）、《山椒大夫》（1915）、《涪江抽斋》（1916）、《伊泽兰轩》（1916~1917）等。在创作上，森鸥外一直保持着不与流俗共进的姿态，因此拒绝自然主义的创作倾向；在政治思想上，强调对国家负责，把个人摆在与国家休戚与共的位置上。“森鸥外型”是竹内好关于森鸥外浪漫主义文学的提法，认为表现的只是对封建主义的感性反抗。在竹内看来，鲁迅的现实主义与此相反，是伦理和意志的表现。——译者注

为“真正的个人主义者”的鲁迅，我要向鲁迅探寻的问题，如果会因“真正的个人主义”这一提法而被误解，那么便是构成西方近代文化根底的“个”的思想^①方式。因为我认为，在上述第一点的意义上，这是鲁迅掷给今天的日本和中国的共同课题。

鲁迅“个人主义”的发展阶段

在保持上述问题的同时，我想尽可能通俗浅显地从“小说家”这个侧面来入门式地概观鲁迅的生平。我的粗略看法是，在他作为“小说家”的道路上，我说的“真正的个人主义”，大致经历了以下几个发展阶段。

成为小说家之前的鲁迅

鲁迅 1902 年（明治三十五年）21 岁时留学日本，在日本生活了七年。这期间，他首先接触了自然科学，然后又接触了以尼采（1844～

① “个”的思想，这是本书的核心概念，是作者伊藤虎丸首次使用的。在一般的意义上可概括为这样一个命题，即“人是被自觉为个的存在”，“个对于全体（如部族、党派、阶级、国家等）不是部分的关系。”也就是说，人的价值，只有在他获得真正独立的意义上才能显示出来。伊藤认为，西方近代文化（思想、制度、科学、文学、道德等）的全部意义就包含在这个命题里，这个命题代表着西方近代文化的“根柢”或“神髓”。在他看来，鲁迅对西方近代的理解和接受就是对这种“根柢”和“神髓”的把握，体现了具有普遍意义和新精神的东方的个性。对于鲁迅来说，“个”的思想，具体意味着一个“个的自觉”过程：首先，鲁迅留学时代因接受尼采的“个人主义”而产生“觉醒”（或者说通过尼采的“个人主义”把握到了西方近代的“神髓”），并以此为视角展开了对传统价值观（传统文化）的批判，但他这时还不仅仅是站在新的“普遍价值”或“真理”一边，并未获得真正的“自由”和“独立”。其次，后来经过一系列挫折，鲁迅开始把自己相对化看待，认识到自己不是一个曾经设想和憧憬的“英雄”。这时，他再次从新思想和新价值中分离出来，实现了从被真理占有到占有真理的过程，其标志是小说《狂人日记》的诞生。伊藤认为，鲁迅的价值不在于他接受了什么“主义”（如进化论、个人主义、马克思主义），而是他“个的自觉”，在重建和发展民族文化（人或个性）方面所显示的意义。因此，他反复强调鲁迅“个”的思想，为日中两国今天的文化提出了共同课题。关于“个”的思想，可参看本书的有关部分：《致中国读者》、《作者的告别青春，获得自我的记录》（第三章）、《结束语 鲁迅对现代的启示》。——译者注

1900)、拜伦(1788~1824)、齐尔凯克尔(1813~1855)、易卜生(1828~1906)等人为代表的19世纪西欧近代思想和文艺,从中他发现了与中国五千年传统文化完全异质的精神,并且认同“其度越前古,凌驾亚东”(《文化偏至论》)的优越性。他留学时期的思想,被说成是“掇物质,张灵明”的尼采式的个人主义思想,他后来的文学主题,叫做萌芽也好,几乎全部都可以在写于这个时期的评论中找到。

他当做欧洲近代文明的神髓来把握的“个人主义”的人的观念,是怎样的呢?特别是将其放在同时代的日本文学思潮中来看待时,会找出怎样的共同时代素养,又会找出怎样的接受西欧的不同态度呢?我想把这些问题都作为面对西方近代文明入侵的亚洲近代文学



问题,在和石川啄木^①、高山樗牛^②、内村鉴三^③等几个日本的文学家、思想家的对比过程中来予以探讨。

-
- ① 石川啄木(1886~1912),本名石川一。岩手县人。日本近代歌人、诗人、评论家。早在中学时代便有诗名,后做过小学代课教员、新闻记者,并从事小说和社会评论的写作。石川啄木从少年时代起就一直遭受病痛的折磨和不适打击,这使他倾向民主主义和社会主义,其诗集和评论,不仅具有冷嘲谐谑和感伤,也具有尖锐的社会批判性。主要作品有歌集《一把沙土》(1920)、评论集《时代闭塞的现状》(1910)、诗集《呼子与口笛》(1911)、歌集《悲伤的玩具》(1912)。其中的《时代闭塞的现状》,在明治政府镇压社会主义运动时,成了当时有名的“呐喊”之声。——译者注
- ② 高山樗牛(1871~1902),本名林次郎。山形县人。日本明治时代思想家、评论家。樗牛思想的显著特征是,在其短暂的一生当中,经历了从“浪漫主义”到“日本主义”,再到“个人主义”的转变,象征性地代表了同一时期日本思想界的躁动与苦闷。正如他死后人们所指出的那样,樗牛的苦闷来自如何解决人生问题。早在中学和帝国大学期间,他和其他人先后创办了《文学会杂志》(1891)、《帝国文学》(1895),不仅发表了许多评论,也发表了小说《龙口入道》(1894),表现了怀疑人生、崇尚文学的浪漫主义倾向,主张“爱”才是人生幸福的最大源泉,而“殉情”则是幸福的爱的最后。1897年任《太阳》杂志主要撰稿人之后,开始主张日本主义,乃至发展到国家至上主义。以1901年《论美的生活》和1902年《日莲上人是怎样的人》这两篇评论为标志,开始转向个人主义,赞美尼采,主张个人的价值高于一切,给此后的日本思想界以极大的影响。——译者注
- ③ 内村鉴三(1861~1930),日本明治、大正时代基督教著名领导人、思想家、传教士。生于江户。幼年接受汉学、儒学教育,1877年进札幌农学院,并开始信奉基督教,毕业时和当时同期、后来成为日本近代教育家的新渡户稻造一起宣誓,把自己的一生献给两个“J”(Jesus和Japan)。毕业一年后的1882年,成立札幌独立基督教会,以力图使基督教摆脱外国教会的控制。1884年赴美国工作并学神学,完成了内心世界向基督教的转变。回国后,任第一高等中学讲师。1891年1月,因拒绝向《教育教语》敬礼,即所谓“不敬事件”而辞职,这一事件引发了全国规模的国家与宗教问题的论争。在此后数年当中,内村都一直被骂为国贼。这期间,内村相继完成了《基督教徒之慰》(1893)、《求安禄》(1893)、《地理学考》(1894)及英文著作 *Japan and the Japanese* (1894)、*How I Became a Christian* (1895)等代表作。1897年起,任《万朝报》英文栏主要撰稿人,又相继创办《东京独立》杂志(1898)、《圣书之研究》杂志(1900),在基于基督教教义对进行激烈的社会批判和文明批评的同时,主张无教会主义。1903年,在日俄战争前夕,因主张非战论,而和幸德秋水、堺利彦等人一起退出了《万朝报》社。内村不仅以无教会主义的基督教的主张,震撼了日本的基督教界,也在宗教、教育、思想、文学、社会等方面产生了深远的影响。——译者注